

传播学视角下中英“礼仪之争”再审视

张兵娟 李 阳

摘要:公元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来华导致的“礼仪之争”,是东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碰撞与冲突,也是40余年后爆发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件的评价大多只批评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漠视或者忽视马戛尔尼使团暗藏的殖民主义扩张意图。后殖民理论批评,从传播学视角重新审视、传播者的传播动机、传播手段以及在传播中由于中英价值观念的偏差导致的认知障碍等因素,明确指出英国使团表面的贸易诉求背后是殖民霸权倾向的传播动机,礼物媒介的选择暗含政治文化的较量;同时通过中华礼仪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对比,对中国特有的宾礼朝贡制度及其背后支撑的天下传播秩序模式进行了深入阐释。可以说,笼罩在近代史中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虽已远去,但印刻在心理上的殖民思维并没有消散。重新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明扩张史保持一份警醒,纠正“中国故事”中丧失主体性的长期失语,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和中华文明。

关键词:中英礼仪之争;跨文化传播;东方主义视角;马戛尔尼使华;文明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0)05-0102-14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XW044)

公元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为扩大对华贸易、打开中国市场,以向乾隆祝寿为由派遣马戛尔尼等人组成规模浩大的使团,携大量代表西方工业文明成果的礼品价值达15160英镑^[1]。而清廷方面对使者实质来意并不知情,仅将其作为一次普通朝贡觐见,令乾隆“深为不愜”^[2]的是马戛尔尼拒绝按照宾礼规范行三跪九叩的最高礼节,最终英国使团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失败而归。

纵观中西文明交流史和传播学学科发展史,长期缺乏从中华文明的传播视角和立场开展中华本土传播现象研究。造成这种失语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始于那场中英“礼仪之争”,始于导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那场鸦片战争——中国近代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谒见乾隆所恳请的十一条中心内容基本一致,仅是专使乞请与武力逼签的差别^[3]。西方殖民渗透早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由诉求到行动、从谈判到胁迫只是殖民手段和暴力程度的不断升级与强化。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外开放,一些清廷档案的披露使相关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同时也为国际政治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学依据。笼罩在近代史中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现在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印刻在心理上的殖民思维并没有消散。在该事件的历史评价上往往无视历史语境与东方视角,而以“闭关锁国”“停滞”和“专制”等词概括之。据此,笔者从传播学角度将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放置于话语政治的重塑之上,重新审视马戛尔尼使华事件,试图还原历史真相,揭露殖民者的本来面目,讲好“中国故事”。

一、中英礼仪之争相关文献综述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这场中西相遇因文化冲突而引起一系列误会和措置失宜,中国

不识英国威力强迫其行清廷藩属制度礼仪,导致中国丧失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固守贸易范围限定终自食其果^[4]。张之毅、朱庸等国内学者对英国遣使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乾隆决策利弊得失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评价^[5],认为乾隆以限关自守的政策拒绝一切外交要求是幼稚可笑的,这种抱残守缺给中国社会种下了日后沦为半殖民地的祸因^[6]。类似现代主义观点随后遭到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反驳,为该事件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

(一)从现代主义批判到后现代主义分析

国际范围内首次讨论热潮始于1993年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国学者戴逸、法国学者佩雷菲特等人,主张清帝国应对中英交往的失败乃至中国近代的落后负主要责任:乾隆无视英国产业革命成果及背后的科技水平差距,固守传统窒息了中国的进取精神^[3],清廷领导缺乏变革意识错失借鉴外部的良机^[3],清帝国拒绝英使扩大贸易请求,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映^[3]。总之,乾隆虚骄自大、故步自封加之英国不尊重中国主权^[3],一次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机会在乾隆手中错失。另一派观点则以美国学者罗威廉、何伟亚等人代表,指出将英国使团的失败归因于清廷的固执、嫉妒与排外,以及强调传统与现代社会间存在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解的观点,都是为欧美19世纪在中国的帝国冒险行动作辩护提供借口,并将其视为中国排外主义的范例。^[3]将西方与亚洲的关系看作进步性-停滞性和自由-专制完全对立的表述,以及视亚洲为缺乏自助能力的古怪孩子、需要西方予以家长式指导的观念,都是一种东方化概念的体现,英使所代表的自由贸易是西方话语诠释下的利己主义和帝国主义贸易。^[3]

第二次讨论热潮因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获得1997年度美国约瑟夫·列文森最佳图书奖而掀起。何著将研究置身于与后殖民主义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对话之中,针对传统的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指出“部分由国际法所定义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已经自然化的权势话语”是欧洲全球扩张的典型产物,用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阐释或评价清帝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礼仪并不具备协调一致的可能性。^[7]

国内外学者围绕何伟亚的研究方法及观点,一度于《二十一世纪》《读书》等杂志上展开激烈论战。美国汉学家周锡瑞批评何著在史料研究方面言过其实,只批评启蒙运动的公共领域而未提出用何种政治制度予以取代。^[8]华裔学者张隆溪认为何伟亚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后现代式生硬解读,想当然地借用后现代主义多元化和消除中心的观念刻意否认清廷的宾礼有华夷之辨。^[9]罗志田则认为何著在“怀柔远人”等史料的解读上较其批评者更接近原意,主张评价类似后现代主义著作时应尽量避免以“现代”标准衡量^[10],而何伟亚的研究正是具有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或事件放置于其所在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的取向^[11]。美国学者艾尔曼、胡志德认为周锡瑞对何著的评价有失公允,何著从考察清代对外关系与近代欧洲外交演变的角度重新评估了马戛尔尼使团及其访华活动,是修正西方偏见的延续。^[12]杨念群、葛剑雄则从研究方法与态度上评价此次争论,认为科学的结论建立在对史料的正确理解之上,反对先入为主、因人因派立言^[13],研究应“正视当代思潮中所隐蔽的核心论域,而不是以常识批判为名回避实质性问题的交锋和讨论”^[14]。

(二)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展

在此之后,学界对该事件仍保持浓厚兴趣,陆续有诸多成果出现。如赵刚认为以现代化叙事模式为唯一参照标准的分析忽略了中外关系的复杂性,评价西方时不应只强调西方变革、重视科技革命、指责乾隆决定的荒诞,无视乾隆时代中国所实际面对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15]邹振环从儒家的夷夏传统出发,认为中英礼仪冲突是强调礼仪至上和充满功利色彩的文明冲突,在根本上是封建王朝中心的天下观与主权平等的国家观冲突。^[16]但兴悟从国际体系差异着眼,视马戛尔尼事件为近代西方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与东亚同心圆朝贡国际体系的冲突,认为中英双方在互动模式以及互动规则上所存在的共识缺失与对立。^[17]这些宏观的中西对比视角将中英礼仪之争置于一个更为广

阔的平台之上,对于重新定位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在中观和微观研究层面上,李勇系统分析和梳理了西方对该事件所开展的多维度历史阐释^[18],曹文娟、张振明以中国法律的对外传播为切入点,侧面给予马戛尔尼使团肯定评价^[19]。巫鸿将马戛尔尼使团的随行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在中国的现实主义画作与他的前后时代作品进行对比,分析了这些“废墟”式图像在影响西方对中国看法方面如何产生影响。^[20]万婧从跨文化传播视角运用面子协商理论,分析了叙述史事中双方在面子冲突、面子博弈与面子协商过程。^[21]这些观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放大了礼仪之争中的细节问题,为多维度认识评价中英礼仪之争提供了有益参考。

此外,一些学者围绕相关史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台湾学者黄一农的《龙与狮对望的世界——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的出版物为例》,英国学者R·N·斯旺森的《马戛尔尼使团档案资料追踪》,欧阳哲生的《狮与龙的对话——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经验”》等文章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结束后大量的出版物及有关档案进行了细致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探索成果当属黄一农的《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该文结合中外有关马戛尔尼使团及英国第二次使华使团即阿美士德使团的翔实史料回归基础上,对相关历史进行再度梳理还原,并对双方叙事落差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22]在学术专著研究方面,整体上并未有较多新的理论研究观点呈现,如朱庸的《大国病》仍坚持批判乾隆在对外政策方面保守与失败,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对清朝的朝贡制度与外海国家交往的矛盾状态进行了分析。还有一部分学者从政治外交领域开展研究,如何新华的《威仪天下——清代外交礼仪及其变革》、王开玺的《清代的外交礼仪与外交礼仪之争》等等,这些著作注重对马戛尔尼使华事件发展脉络的梳理和描述,整体上欠缺对事件的评价和分析。

(三)后殖民理论中的东方视角与传播视域下的再思考

后殖民理论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直接殖民亚非拉地区的时代结束后的时间分段,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外在显性殖民干扰逐渐褪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终结,以文化帝国主义为代表的隐性殖民仍四处暗藏潜伏。如何在走近西方现代化的世界模式设计时仍保持有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后殖民理论所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落后就要挨打”是近代东方中国惨痛的历史教训,时刻鞭策中华民族居安思危不断前进,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缺陷。蛮力胜于人文、强者即为有理的观念传达的是浓烈的霸权主义逻辑,主流观点似乎暗含了清廷只能顺应西方意愿的倾向,实则是对历史史实的片面消解和回避。

传统史学观点以一种回溯式的先验主义观点来看待这次中英首次正式交往,均在相当程度上强调清王朝的闭关锁国与保守停滞,并将英殖民主义的扩张背景置于次要地位。这种基于刻板印象的论断将清廷的态度与措施看作是对近代西方内部民主与科学进步变革的回应,因而清廷没有理由拒绝打着“先进”旗号的英国使臣所提出的要求。这正与著名文学理论家萨义德的批评相印证——“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东方以及东方的一切,如果不明显地低西方一等的话,也需要西方的正确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23]。换言之,西方以西方研究话语重塑了人们对东方及东方的认知,本应对等的双方叙事地位转而变为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单一叙述,东方长期失语更令包括东方在内的人们确信西方叙事话语的合理性。

后殖民理论可以通过“对殖民主义视角、东方传承机制以及它们的延伸所形成的文本进行的多维意识形态批判”,能够提供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与切实可行的分析途径。^[24]应当看到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使华事件所作宏观分析的一定合理性,但经济因果关系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排除了其他的解释,它将使团活动降低到从属地位^[3],而关于使华传播过程的这些内容恰好是传播学所重点关注的。

跨文化传播交往是一个动态的、双向互动的复杂过程,片面指责清廷未能按照当时西方处理国际关系(尽管如某些科学技术一样被现代的通则所接受)的模式予以反馈,都是脱离具体环境背景的欠妥当表述。西方殖民者在文化上试图证明土著文化的野蛮落后以及宗主国文化的文明先进,“由

殖民主义而来的后殖民时代上演的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化皮影戏”。^[24]外表貌似光鲜亮丽的自由贸易之下隐藏着罪恶的殖民主义,正是出于维护东亚殖民势力扩张的内在需求的目的,直接促使英国将殖民触角延伸到清帝国的地域范围。

客观认识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礼仪之争,承认问题不等于全面否定,合理客观的评价对于建构民族认同心理以及培育文化自信尤为重要。为清廷开脱的观点如禁海加强海防的需要、拒绝有损帝国尊严与安全利益的条款等,虽为其提供了有限的合理性解释,但整体上基于西方进步于东方的历史基调将这场对外传播过程的细节和背景给轻易抹去。然而,不应以西方在一定时期内的科技贡献将当时的血腥的殖民主义美化,尤其是在对待像中国这样受到西方殖民迫害的国家的关系上。下文将研究重心放在中英双方交接过程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双方文明话语的分析,结合时代背景及东方文化的传承机制,对英使殖民主义性质的目的和动机展开批评分析。

二、中英“礼仪之争”的传播学分析

(一)传播动机:表面的贸易诉求与实质的殖民霸权倾向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传播者的动机受制于行为主体自身观念及其所在组织,并深刻影响最终传播效果。马戛尔尼使团作为英国官方授权临时组成的传播组织,为着共同的目标而来,即针对英国在华贸易中的公行垄断、法律争端、贸易逆差、他国竞争等不利状况,力求达到缔结商业联盟、获得商业特权、拓展在华市场的使华目的。^[3]明确的使华目的给予使团潜在的思想指南,使得随行者的言行观感有了共同的情感指向。因而不应将英使团使华动机简单理想化为“平等对话”的交往诉求,暗含政治动机的通商条款也不应被片面单纯化为“自由贸易”的橄榄枝。

使团正使马戛尔尼对整个临时传播组织负责,同时向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两大政治经济利益主体负责。在传播组织的划分上,英国使团、政府以及东印度公司可视为一个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组织团体,使华则是该团体一次积极主动的对外组织传播活动。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互为支持,东印度公司海外殖民活动向英国政府输送大量经济财富,英国议会则为东印度公司提供政治外交扶持。与英国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是海外殖民地的拓展和工业市场的扩张,自由贸易幌子背后总有殖民贸易的罪恶底色。在东亚地区突出表现为“欧洲—印度—中国”路线、以鸦片种植换取茶叶的亚洲三角贸易,“英国人利用印度对华贸易的出超平衡英国对华贸易的入超,利用英国银行资本和信用制度,通过英印中之间的三角汇税将印度和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输入英国”^[3]。

东印度公司作为使华活动的直接利益关联方,马戛尔尼受其经费支持并对其负责。东印度公司是该链条的最大获利者:英国于1708年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逐步垄断对亚洲的贸易,1773年通过《东印度管理法》并设立统治英属全印度权力的总督,1784年成立直接听命于内阁的印度事务管理委员会。英国资产阶级对亚洲地区市场的重视,正是基于迫切需要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动机使得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建议下开始向中国派遣大规模的使团。^[25]在东印度公司上层在给马戛尔尼信件中指示他“应放大目光,以冀获得更充实而有用之情报与实际利益”“切不可损害目前之地位,致有碍于美好之前途”,在华行动“惟有热心谨慎,为公司谋福利耳”^[28]。可见东印度公司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小心谨慎,保持既有利益不被触动的前提下促使中国开放更大的市场是基本原则;英国政府作为使华活动的名义发起者,动用政治外交力量强化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商业贸易关系则是使华的根本动机。

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马戛尔尼十分确信欧洲对于非欧洲的优越性——认为贸易和外交是“正在获取更高层次进步中的欧洲为其他社会树立效仿榜样”的媒介,“商业和知识传播将引起其(非欧洲社会)自身的和平革命”^[3]。马戛尔尼凭借丰富的外交履历被英国政府任命为特使,在对华交往方面以代表英国国王的形象出现,同时因受资助于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谈判中要代表其商业利益、表达东印度公司的诉求。因此马戛尔尼首先要保证完成来自以上双方的指令,“取得以往各国所未能用计

谋或武力获致的商务利益和外交权力”^[26]。具体而言,不仅希望通过谈判方式解除清政府的外贸限制,同时试图尽可能多地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即如英王乔治三世暗示:中国“是地球上第一个神奇的国家,因而组织这次旅行显得尤为必要”^[27]。

综上所述,马戛尔尼使华态度并不和善,其实质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一体化、亚洲殖民扩张利益驱动下,带有预谋性质的殖民试探。正是这样一种殖民野心也必然使得马戛尔尼使团在与领土安全意识十分警觉的乾隆君臣交涉时难以藏掖。

(二)传播媒介:“礼物”的选择与政治文化的较量

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礼尚往来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重要交往形式,礼被视作是万事万物的准则,“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29],在为人处世、人际交往方面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评判依据。君子观察事物、明辨是非都应礼为标准,《礼记·礼器》所言“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礼,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礼,弗之信矣”^[29],言行处事只有合乎礼制才能够获取别人尊敬和信任。国家层面以礼物为媒介的交往形式主要集中在“宾礼”,即用于诸侯朝觐天子的朝聘会同礼节仪式。朝聘礼在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活动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礼·大宗伯》中说:“以宾礼亲邦国”,设置朝聘礼的目的在于“使诸侯亲附,王亦使诸侯自相亲附也。”^[30]诸侯朝聘时以地方特产为礼物进献天子来表达亲近归附之意,天子则奉行厚往薄来和怀柔远人的理念予以关照,如果对方带来表示以友好态度的礼物,那么王权政治一定会报之以更大的礼物回赠。

礼物作为一种携带有传者内在情感的传播媒介,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传播表达的效果。合适的礼物从一端传递到另一端,经由无声语言的对话后的陌生主体关系便具备了缓和的可能性,进而可以为后续深层次交往积累信任。如果礼物选择不合时宜,非但毫无信任可言,反而会徒增接受者的误解和猜疑,马戛尔尼使团的首次“见面礼”就遭遇了适得其反的尴尬。

英方挑选了他们认为具有实用价值且能使年迈的乾隆产生兴趣的现代科技事物^[27],而乾隆并未摆脱将技术发明归为奇技淫巧的认知局限,对这些科技前沿事物并无兴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被乾隆称作贡品的礼物当中,不只有天文仪器,更有配备110门重炮军事装备的英国最大军舰的模型,“各个细微部分俱然在模型上表现无遗”^[27]。该模型旨在炫耀素有“海上之王”和“首屈一指的欧洲海军强国”称号的英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在中国的政治语义中高配置军事装备代表着军事威胁与战争挑衅,尤其是在了解使团的小型野战炮表演情况后,乾隆更证实了他对于英使来华军事动机的担忧。

英国使团虽注意到清廷的疑惧,却未能做出准确解读。“生怕中国人认识到英国人的威力高出于鞑靼人”^[27],将疑惧信号错误释码为羡慕嫉妒的表征,双方对于礼物媒介所传达出的符号象征意义产生了严重分歧。天文仪器和大炮模型均可视为科技成果的展示,但后者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装备,其符号所指含义的攻击性远超科技性,过分的技术炫耀消解了使华由头——就名义上的君主祝寿、友好交往而来(在乾隆君臣看来这是英使来华的唯一目的)。与乾隆分别回赠英国国王和正副使玉如意、如意相比,带有攻击性、侵略性的精良武器装备昭示的只有威胁而非使团宣称的友好。与其说是进献给乾隆皇帝的贺寿礼物,倒不如说是不言而喻的挑衅,任何一个有着安全意识的政权对此有所警惕和怀疑都是无可厚非的。

使团试图通过礼物展现英国各方面的优势,为谈判博得更多筹码,然而无视礼物属性与礼单措辞的友好性,暴露出军事殖民主义肆意横行的常态。18世纪的英国赢得了世界海上霸主地位,殖民霸权的强势和优越心理随之渗透到对外交往关系,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宣称提供了资本和注脚。英帝国派遣使臣表面上看似友好往来,实则由于忌惮尚未了解的中华帝国,不敢贸然采取武力行动。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为武力侵略开先锋的情报搜集工作是使团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层含义上,礼物中的军舰模型以及武器装备与鸦片战争时枪炮猛攻的目的相一致,都旨在塑造一种欧洲文化高人一等、居高临下的压力。漠视东方的欧洲中心主义总是在宣扬同一性而否定或压制异质性——亚洲

文化与其所属的经济体系都应当适应并被纳入欧洲体系中,宣称平等自由的英国其实是利己主义的霸权行径。

(三) 传播认知:价值观念的偏差与跨文化障碍的形成

跨文化传播理论认为,认知是借以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途径和方式,能够将外部自然力量转化为有意义的个体经验,文化影响信息选择偏向以及认知模式的后天习得并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31]政治礼仪是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表征,参与者选择或践行怎样的仪式规范反映其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认为,人的意识是根据体内存在的既定“结构或完形”有选择性地构造,外在环境触发人的生理感受,最终影响意识的构造性选择。^[32]个体在陌生环境中的意识判断通常会不断与既有思维观念相印证,有选择地捕捉其所在环境的信息。英国使团面对跨文化中的跪拜礼节仪式,产生了陌生环境信息与既有认知结构的错位偏差。跪拜礼作为中国传统礼制社会中一种通过“自卑而尊人”^[29]形式向尊者致以礼敬的高规格礼节,它的产生与中国古人生活起居密切相关,后逐渐发展为以三跪九叩这一最高礼节形式为代表的礼敬制度。上至朝臣拜见、外使觐见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参拜和祭祀“天地君亲师”,跪拜礼普遍实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同一种交往仪式在中西文化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清廷以叩首方式表达尊敬,英国文化则认为跪地磕头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且令人厌恶的卑下行为。使团副使、英国探险家和植物学家斯当东认为,中国叩拜礼是世界上最能表示“行礼者的恭顺卑贱和受之者的神圣崇高”的行为^[27],先入为主的观念意识为英国人的认知蒙上了显在的偏见,未能理解中华礼仪文明自古而下、一脉相承的存在合理性。于是马戛尔尼首先断言欧洲礼节优越于中国,进而“为了证明维护自己国家的行动的价值而给其他国家的行动抹黑”^[32]。使团因厌恶叩拜礼而生的优越感的背后是英帝国雄霸欧洲乃至世界的时局,国家实力优势无疑助长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自我优越感。

根据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对文化划分,中英文化分别属于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的中国文化与低语境的英国文化相比,更多的信息存在于物质环境、内化于人的身上,较少的信息需要经过编码显性输出。^[33]缺少显性信息代码的中国文化对于马戛尔尼使团来讲意味着需要内在的领悟和感知来适应中国文化,显然他们在察觉意义丰富的高语境文化方面十分欠缺。马戛尔尼多次因礼仪问题有意无意地冒犯乾隆君臣,在清廷看来这无疑是对清廷政治权力秩序的挑战,出于顾及封建王朝颜面的考虑,乾隆做出相当程度的让步,目的是在不爆发更激烈的正面冲突的前提下使马戛尔尼使团尽快离开。乾隆表面上有所让步,实则已经开始反感使者的不知礼数并对英使团来华动机产生警惕。另一端的马戛尔尼始终在以谈判式视角审视在中国的待遇,非但没有意识到清廷态度变化的真正原因,反倒是为其礼仪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迫使清廷做出让步感到窃喜,令他确信清廷声称的“永恒不变”不过是“一块用以抗拒理性和争执的盾牌”,他认为使团在礼仪问题的强硬是打破清廷所称不可改变原则的典型案列^[7]。马戛尔尼尽管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但对清廷态度变化的感知判断显然是失败的。

马戛尔尼使团与清廷初次交涉,并非是也并不愿意使英国成为清帝国的藩属国,因此为体现与藩属国的区分更坚定了拒绝行跪拜礼的决心。实际上清宾礼是一套有着历史传承的完备礼仪制度,增删变化都要经过详细的论证,大清外交礼仪并非特意针对此次英使来华而制定。既为宾客,就当遵照大清宾礼行事,是否行跪拜礼也不是区分藩属国与互市国的标志,因此三跪九叩的最高礼节同样适用于西洋国家,不存在因歧视侮辱英国使团而特意设定或更改接见礼仪的情况,行跪拜礼并不是有损英国尊严的特定仪式,所谓的损害只是存在于使团的自我想象中。

事实上,乾隆也并非完全不顾风俗习惯差异,强行要求英使行叩拜礼,他曾经在给钦差徵瑞的谕旨中表现得很通融:“若该贡使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叩见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以勉强”^[2]。从清廷角度看,如果说有所差别对待的话,也是出于怀柔远人的封建王朝常规态度予以宽容接待,而非强人所难。英使团既然以向乾隆贺寿而来,清廷自然而然要按照

此前西洋诸国的朝贡礼仪对待,将其划列至朝贡队伍。

1817年,以阿美士德为首的英国第二次使华再度因拒绝行跪拜礼失败而归,途中得到了法国皇帝拿破仑接见。同样是在对待异国民俗的态度上,拿破仑认为到访别的国家就应当本着入乡随俗的态度去服从所至国家的习俗,“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像英使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是不应当的^[34]。马戛尔尼作为英王的全权大使,在英国是英王臣子,在清朝君主乾隆面前即便是代表英王而来,在乾隆面前也是出于臣子身份的地位。“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34]。因此从礼仪对等的角度上来看,本着欧洲平等尊重的交往理念,像臣子一样向乾隆行清朝通行的跪拜礼反而是得当的。

(四)传播过程:译者的“把关”与信息传递中的衰减失真

翻译问题是中英双方开展对话面临的首要困难,实现跨语言、跨地域、跨文明有效的传播互动,有赖于翻译者把关人的角色发挥,翻译者如何介入到对整个交往活动来说至关重要。在华传教士将英王信件以及使团想法翻译成符合清廷传统的文字语言,翻译水准直接影响双方信息编码、解码、译码的准确程度。一方面囿于双方正式的翻译人员都不懂英语(为华人书院中找到的名叫周保罗、李雅各的中国教士),沟通交流被迫采取借由拉丁文多重转译的模式,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另一方面清廷派出的翻译如贺清泰、罗广祥、索德超等欧洲籍传教士对英国使团保持有协助倾向,英国文本中有违欧洲外交礼仪和英国尊严的表达被予以删改,译出的中方文本则用词相对简单谦卑,艰难的翻译直接促使中英双方文本的本意与客观性大大折损。^[35]

文牍语言作为一种规范严格的信息表达形式,其程式化的表达将现实情况简化,多样立体的现实变得僵化刻板。将英王文书译成清廷文牍语言格式是翻译的重中之重,为塑造出中英地位形式上的“平等”,中译文的表达上刻意模仿清朝皇帝的口气,“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36]极具东方色彩的表达修辞反倒表现出英使团入乡随俗的“风度”,这正与拒绝行清廷跪拜礼节的固执形成鲜明对照。忽视具体情境而生硬套用并不熟悉的异国文牍语言,全然一副志在必得、强权外露的形象。

中方的文牍语言文本传递中同样存在问题,如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奏折中称马戛尔尼使团“情词极为恭顺恳挚”^[36],简短数言便概括出使团的态度,远在北京的乾隆也正是凭借总督所呈奏折上的抽象文字符号判断使团的“忠诚”程度。该表述最大的问题在于并没有详细的言语行为指向,即如何称得上是“恭顺恳挚”?使团的具体呈现表现又是怎样?寥寥数字不能准确反映出丰富复杂的现实情况。结论式的文牍语言使得乾隆结合以往经验确信使团的恭诚,认为马戛尔尼使团与乾隆十八年博尔都嘎尔国遣使入贡一样,“此等外夷输诚慕化,航海而来”^[36]。

文牍语言使初步交涉时的事实信息传递过程经历了从复杂多面立体的场景,到精简程式化的结论评价,再到经验判断式的解读。文字符号经过多重编译形成一个并不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信息环境,乾隆对“恭顺恳挚”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如梁肯堂在奏折中的表述,于是信息在文牍语言表述时出现了转译偏差。固定僵化的文书格式将原本复杂的情境束缚在了有限且生硬的辞藻上,为乾隆准确理解事实情况并据此做出恰当决策增加了无形阻力,使得信息两端的传受双方间的传播隔阂不断加深。来自传播动机和文化属性差异的巨大传播障碍,使得双方在反复的信息传递中走向两个迥异的极端。最终马戛尔尼看到的是一个骄傲到不可理喻的乾隆及其旧欧洲封建式的没落清王朝,而另一方乾隆则看到的是一个不知礼节的狂妄使臣。

中英双方在传播互动过程中不仅有翻译人员在政治文化观念上的障碍,还有中国当时政治传播体制中的把关制约。在一定意义上,“朝廷与省级官员的对话以及这些对话通过上谕得以广泛传播”^[7]。乾隆指派的钦差除了将译文及交涉情况呈给乾隆外,还会加抄一份送抵军机处;反过来,乾

隆下达的谕令经由军机处后再传达给下属官员。处在信息管控环节中的每个权力持有者都直接(向下一环节目标受众扣押、隐瞒所接收到的信息)或间接(理解、翻译和转述方面的偏差)地对信息有效传达起着把关作用。多方明暗不一的权力利益较量使得文本信息环境变得复杂浑浊,而现实文本呈现本身不能够反映其背后真正的话语权力归属。

君主专制下的官僚关系处于一种谨小慎微的高度紧张状态,钦差松筠在上下级垂直传播过程中并没有(事实上也很难做到)准确定位其自身角色。专制色彩浓厚的传播制度在上传下达中,带来的信息传播压力迫使钦差微瑞在英使没有明确答复是否行跪拜礼的情况下向乾隆打谎报,而乾隆正是依据此消息下达指示——“微瑞奏,英吉利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微瑞随时导教,俾臻妥善”^[2],明显偏离事实的上报以至临近寿典时出现双方说辞不一的紧张局面。层层把关的政治传播体制下,信息传播渠道是封闭单一的,使团作为传播者从发出信息到乾隆收到信息,中间所经历的传播程序与环节不只是制度表面上的“使节—钦差/总督—皇帝”两级传播过程。和珅等核心权力人物在乾隆与马戛尔尼信息沟通传递中间发挥着至关重要把关作用,政治制度同文化背景、政治立场一道形成的传播隔阂无疑影响了整个事件进展。

三、天下观念中的宾礼制度与传播秩序

中国政治传统中“天下”的概念有别于西方帝国模式及现代民族国家,它以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为主要结构,一种关于世界概念与帝国理想的表述——天下近似于一个世界社会,能够为理解世界、人民和文化提供基础。^[37]“天子”具备圣德以引四方远人仰慕向化,是上天选定的治理天下的唯一最高统治者,其所在之处为文明的中心。^[38]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所衍生出的宾礼,将权力以礼仪形式予以固定,并在历朝历代的政治实践形成一套系统完备、德济天下的交往制度。按照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天下是最高级的政治单位,家国同构机理下的世界秩序是一个相对格局:地域空间划分以礼仪文化为依据、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向周边呈同心圆式扩展延伸。

儒家主张运用文德教化的软实力传播而非武力威胁,即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9],以此达到吸引远人归附、增强向心力的目的。在封建王朝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封建王朝以宾礼相待,通过怀柔远人这套复杂的交往礼节,维持对天下四方诸侯的政治统摄关系,诸侯藩国则定期朝聘。《礼记·中庸》将怀柔之道列入天子治理天下的“九经”,“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方能柔远人,“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方能怀诸侯。^[40]

宾礼作为建构天下秩序的媒介,四方蛮夷只要奉表文、进方物进而获得天子册封,方可以天子外臣的身份被纳入天下秩序之中。^[41]《周礼》规定诸侯会见礼依四季时节、朝觐缘由的不同而有特定指称和目的,“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30];而天子则会以“时聘、殷眺、间问、归脤、贺庆、致禴”的方式对诸侯进行示好、道贺、赐福和赈济,以示天子怀柔之道。在宾礼朝觐频次和周期上,明确以贡期对朝贡时间予以限定,达到密切友好邦国交往与阻挡潜在敌人无限闯关的双重效果。^[42]

中国历代宾礼仪式因时局不同略有差异,但在核心思想上仍保持着较大相似性和延续性,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修订编纂的《大清通礼》对礼制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宾礼部分开篇引用《周礼》的规定,首先确立四夷属国的地域差别,“周礼大行人掌宾客之礼仪,九州以外谓之藩国,各以其贵宝为挚”,进而明确各自职责:“朝贡之礼,凡四夷属国按期修职责,遣其陪臣赍表文方物来朝”^[43]。使团朝贡首先由贡使向边境督抚提出申请并经后者上奏朝廷予以批准,地方督抚审查国书及贡品并确定进京日期、选派官员护送至京。使团于住宿会同馆次日向礼部呈递国书和表文,礼部拟定觐见日期并安排贡使到鸿胪寺演练觐见礼仪,待贡使到鸿胪寺演练熟练觐见礼仪后,皇帝接见使者。使团在京停留约40天,临行前皇帝给予使者及使团丰厚赏赐,最后由来时护送官员后沿原路护送返回

边境,边境督抚宴请贡使并护送出境。^[42]整个朝贡过程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以体现封建王朝皇帝的威仪天下和对藩属国使者的关照。在马戛尔尼使华之前,清廷与西方诸国如荷兰、葡萄牙、俄国使团虽在一些礼仪问题上有所交涉,但最终都接受了向当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安排,因此这些涉外经验总体上仍符合清廷的宾礼制度设计。

封建王朝夷夏观念显然与英使的既有认知大相径庭,尽管英国使团的地理认知较清朝时期的中国更接近事实,确信地理认知对政治观念的影响,但应当警惕的是,政治观念不因地理认知的准确性提升而变得高尚,政治话语权却深刻影响自然科学的外在表述。拥有在现代地理知识的使团,很难接受封建王朝中心观念下代表差序秩序的政治礼仪。探险经历丰富的使团副使斯当东认为,自称中华的中国人自认为其处在地球平面中心,其他渺小的国家都处在地球边沿,对地球和宇宙关系的理解尚处在完全无知的原始粗糙状态^[27]。18世纪的西方对于世界秩序的认知,随新航路开辟、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扩张等世界范围内活动所带来的地理知识积累的增加而趋向客观,与此相对照的东方清帝国则仍旧延续着三代以来的天下秩序观念,疆域以外的藩属国仍称之为“夷”,大洋彼岸的英国在清帝国的世界秩序中同样属于九州之外“夷”的地域范畴。两种世界认知意味着不同的传播秩序观,而差异化甚至相左的传播观形成各自的价值体系,影响到政治权力与交往仪式之间的互动格局。

天下观念指导下的差序传播秩序是多元和谐共生的,而非单一暴力排他的,中国虽担负有维持封建王朝礼制体系的职责,却并不意味着拥有对四面八方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以及文化渗透的权力。^[44]在东方社会群体普遍认同的共同宇宙空间中所确立起的以远近差别为依据的交往秩序,与宣称平等理性的近代西方所执行的血腥殖民秩序观相比,仍不失为一种平稳温和的传播秩序。承认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地理认识的局限性,但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的延续性,至今我们仍称自己所在的这方土地为“中国”或“中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仍然固守着宇宙中心的旧时,而是出于历史的延续,文化血脉的延续。对比世界地理基础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秩序观念与华夏中心观念,并没有体现多少“平等”,“远东”“近东”“发现新大陆”等极具主观视角的地理用语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表达,至今仍在被非欧洲国家使用,认同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表达即是在悄然接受对自我的内在殖民。

在清廷封建王朝上国的政治传播秩序的语义中,英使携礼来华祝寿既表明乾隆具有君临天下且能感化西夷的天子圣德,同时促使乾隆君臣确信将英使团视为朝贡“远人”的合理性。而实际上英国此行目的并非是在清廷所主导的天下世界秩序中求得特定位置,于是清廷处在尴尬的“一厢情愿”式角色扮演之中,而整个传播过程本应处在朝贡制度体系下进行。按照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观点,中国朝贡制度与西方列强所强加的条约一样具有不平等性,一旦外国承认天子受命于天统驭万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仁慈皇恩和俯首恭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然要在礼仪的形式上表现为中国朝廷的一项礼节——正式的赏赐和献礼,这是象征接纳夷狄沐受中华文化、赐予的一种恩典和特权而非非耻辱,朝贡关系的礼节在东亚不断扩散发展成为一种手续,借此让帝国以外的番邦在以泽被四海的华夏为中心的天下格局之中取得一定地位,在这种观念下中国朝廷自然希望初次使华的欧洲人遵守这些礼节。^[45]

乾隆帝承认差别且容得下异己,希望来者以“向化至诚”之心认他作霸主,但同时也会承认来者为一方之尊,以“礼”贯彻“怀柔远人”的战略意图,这就大不同于欧洲扩张主义中“征服反抗者、同化归顺者”的主题。^[46]因此,从具体历史环境出发审视中国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抗,没有必要一定在“传统的”框架里去理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许多时候大清王朝和中国政府出于遏制西方列强的侵略的目的,临时拼凑和运用的种种存活策略的措施。^[47]为避免引入具有更高风险性的海外势力,乾隆优先考虑的是维持现有的对外政策,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彼时的开放门户并非当今现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18世纪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渗透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已经令乾隆产生了警觉——尽管英使臣对参与中国南部边界势力纠纷予以澄清式的否认。清朝少数民族政权面临复杂的民族矛盾以及紧张的阶级矛盾,外部大环境的错综复杂最终使得

乾隆在权衡利弊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维稳的保守取向。实际上,正如乾隆的隐约察觉,英国使团来访目的带有很强的情报搜集性质,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清帝国“是一小撮鞑靼人对3亿多中国人的彻底独裁统治”,国家机器看似平稳运行,实则有着随时崩溃瓦解的可能^[48]。无论是对清王朝政治情况的分析,对军事防御工程、沿海地理情况的专业测绘,还是临行时采取的优质茶树株苗,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英国殖民势力在东亚的扩张提供了支持,以至于深刻影响到了19世纪中英政治经济形势的较量。

四、东西方文明进程中的中英礼仪之争

马戛尔尼使华中的礼仪之争是中英两国权力较量的缩影,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49]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一样产生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基础,对其具体传播过程的复杂程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即在大小间杂、环扣叠加的传播活动中不断衍进。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大陆文明因半包围结构的特殊地理因素而相对封闭保守,而以商业贸易立国的西方海洋文明则具有冒险主义,因此从历时性维度来看,东西方大文明秩序分别处在稳定保守和积极扩张的两种状态中。伴随欧洲世界秩序的扩张渗透产生是文明等级观念,并逐渐形成一个“以地球的空间并同时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地缘政治结构。^[50]近代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夹杂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西方文明以一种暴力的、侵略性的态度向欧洲以外的地区输送着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念。

殖民暴力驱动下的全球化不仅推动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同时也在瓦解与欧洲步调不一致的地区文化认同,使欧洲文明在殖民触角所到之处都树立其唯一文明的标杆。德国法学家、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指出近代文明传播中的话语霸权: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国际法主张基督教民族创造了一套适用于整个地球的秩序,并将“欧洲”一词视为地球上非欧洲地区的正常状态的代表,欧洲仍然是地球的中心,而所谓“文明”即等同于欧洲文明。^[51]这条人心轴线与空间轴线并驾齐驱,为欧洲殖民侵略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如果说现代化军事装备是为空间轴线的拓展开疆破土,那么欧洲文明中心主义论则为人心的巩固添砖加瓦。

萨义德指出西方对东方的入侵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渐进过程,根本的变化是对地域和空间的理解的变化,西方将欧洲之东的地域空间命名为“东方的”的做法部分的是政治性的、宗教性、想象性的,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及研究是建立在东方学家所重构的想象的现实形式之中,“西方对东方如此霸道的长期控制逐渐累积起来,其结果是将东方由异域空间转变成了殖民空间”^[23]。1793年的英国使团来华事件代表着处在亚欧大陆两端、跨越不同社会形态与历史文明的交锋与碰撞,中西交往礼节仪式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了18世纪东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这层因素又增强了事件本身被英国社会赋予的象征意义——西方文明高于东方文明的无比优越性。

诚然,西方工业化物质成就带动了近代科技文化方面的进步,但始终未能摆脱海外殖民扩张的利益驱动,殖民主义犹如毒瘤一般伴随近代西方文明的革新。当建立在非正义根基积累上的西方文明随殖民势力传播到古老而保守的东方文明时,沉醉在科技成就之中的欧洲上层知识分子对脚下的殖民阴影避而不谈,却将国际传播交往中与西方文明的任何差异都视为落后的例证,一切差异都会带来欧洲人对其所属西方文明优越感的激增。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反转,嘲笑、讽刺言论一改此前席卷整个欧洲的“中国热”,似乎直到马戛尔尼使华才使得欧洲人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人们只有等到不再认为乾隆所言甚为荒谬时才会理解中国”,具体而言,中国在与西方贸易中的交换需求聊胜于无,西方不过是出于一己之利强迫中国与之通商,力图证明英国在文化上相较于中国的优越性,这种强人所难反映了自战胜拿破仑之后的英国一直在通过使用西方科技支撑下的“更熟练的杀人技艺”的霸权逻辑。^[52]自由贸易与科学技术成就给西方文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助长了欧洲人的自我优越感,使他们确信了欧洲人的优越、欧洲文明的优越、欧洲势力四处自由扩张的优越。

欧洲文明的优越感的滋生有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殖民扩张推动西方科技的发展,进而带来文明优越感的增值,又为更大范围的殖民扩张提供话语支持,直至欧洲中心主义思潮让欧洲人眼中的一切非欧洲事务变得黯然失色。因此,评价近代东西方文明不应忽视西方文明进步进程中的殖民原罪,单方面强调东西方科技文化优劣对比度是对其所依附文明产生与发展根基的忽视,这与承认西方殖民扩张的合理性并无实质性差别。传播活动本身是一个动态双向的过程,传播过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传播效果的停止。相反,中英双方在传播交往中的效果评估直接关系到欧洲与东亚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彼此认知。英使团在使华中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的情报资料,既有主要使者的官方报告及往来书信,也有私人日志笔记。这些资料使得西方整体上对当时的中国国情有了一个全面立体的认识,它们中的大多数此后不久就被公开出版,成为当时高层知识分子重新评估遥远的东亚文明的主要信源。

从使团要员的记录中可以发现大量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以及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马戛尔尼在其记事簿中认为中国的精英与民众同样具有“野蛮人的一切恶习”,不应当将中国和欧洲民族同等视之,因此他希望用“谨慎行事甚至灵活行事的信誉,充分利用近来发生的事情以便今后趁机利用它”^[53]。使团事务总管约翰·巴罗更是宣称其中国行记可以使读者明确中国在欧洲国家文明衡量标准中所处的等级位置——中国人生性猜忌多疑,社交礼仪刻意虚伪,声称的道德是行为的借口,整个民族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经和真浅薄,彬彬有礼和粗鄙下流的奇异结合”,甚至在建筑艺术等领域均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46]使团的官派性质、人员资历、准备周期、礼物挑选等因素极大增强了信源的可信度,故而无论使团成员的观感是否客观公正,马戛尔尼使华事件的相关讯息都能够在英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空间中产生巨大反响。透过马戛尔尼及其私人总管巴罗等人所出版的带有文化偏见、有失公允的见闻记录,清政府的国际形象开始并在英国知识阶层污名化传播,为后来动用战争武力迫使“野蛮固执”的中国扩大贸易的中国市场进行了舆论动员。

与在欧洲的后续传播影响相相应的是,对外交流滞塞的清政府在国际传播的话语权方面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相关记载仅存于皇家官方档案里被长时间封存。清史档案记载中的英国使团来华除了在封建王朝礼仪问题上有些不愉快外,并未有什么特别之处;马戛尔尼使团如众多前来祝寿的藩属国一样归列于封建王朝的宾礼体制之中,除了象征远人归化之诚外,事后如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两相对比之下,清政府的不在场催生了欧洲自恋式的舆论爆发,温和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在欧洲政治家、知识分子的大肆宣扬之下变得一无是处。经过启蒙运动洗礼下的欧洲人并没有做到一如他们所推崇的理性主义,相反,作为英国自由贸易“倡议”的发起者,使团在行动中并未表现出对到访国政治安全与文化习俗的尊重,反倒是以一种惯行的强势态度对待使华事宜,无疑暴露出英王在文书中宣称致力于为人类谋福利的虚伪性。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殖民势力延续并强化了这种霸权主义。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民族国家”之间应基于互惠与主权平等原则开展“国际礼仪”,这个“基督教国家间之礼仪”新国际秩序“未能给清帝国自命的普世主义留下空间……西方完全合理化地迫使中国省思他们退化的外交模式”,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和军事技术手段与拓展海外市场的动机相迎合,为迫使清帝国开放提供正当性依据^[52]。于是在英殖民的逻辑中,拒绝按照“国际礼仪”交往,拒绝同英国扩大贸易就意味着对新秩序的挑战,平等的话语概念是他们自行塑造的,割地赔款也是他们一手操纵的,清廷的拒绝和抵制与英国的侵略和殖民统统被囊括在英国自相矛盾的话语建构之中。

正如何伟亚的分析所言,英国借以自由贸易的宣称来证明对清朝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并在19世纪通过缔结被冠以“和平、友睦、通商”言辞的一系列不平等法律条约形式,迫使中国确立起与他国所谓对外关系的新秩序,于是西方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得到了他们长期所觊觎的权利。^[55]

五、结语

研究中华对外国际传播史,应当兼顾传播双方的传播动机、传播手段、价值观念等因素。在公众

现有的刻板印象中,马戛尔尼使团将当时的西方科技优势展示给清王朝,似乎清王朝本身就应当立即不遗余力地接纳并树立迎头赶上的决心,这种观点本身就是迎合霸权、强权意识形态的表现。不可否认,乾隆君臣的外交决策存在一定的好面子的心理,但也有观点指出,即便是批准英使团的要求,“任由英国殖民者在中国内地盘踞横行,得寸进尺,必然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结果亦难免出于一战”^[56]。英国使华真正的动机是试图以谈判的方式解除清廷对外贸的障碍,并且妄想以占有殖民根据地、治外法权等殖民手段来促成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势力在东亚的扩张;清廷隐约察觉到英使团的侵略动机进而加紧海防,然而面对殖民势力利用现代技术文明的压迫,缺乏全局视野的清朝统治者最终未能闭门保全。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承认对外开放交流必要性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到政治安全的问题,没有安全保障作前提与基础的政治是卑躬屈膝、毫无尊严可谈的。

近代西方文明对于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明而言,始终是一个进步与暴力并存的复杂结构体,普世价值观念包装下物质文明优势逐步向东方渗透,传统的中华文明秩序在被迫中逐步瓦解。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格局得到重新调整,尤其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非欧洲地区的崛起,国际话语权的多元化逐渐取代个别大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局面。在21世纪的当今世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令那些曾经伴随殖民暴力雄踞一方的西方国家感到了恐慌,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正是强者必霸、矛盾难调的西方历史经验和思维观念的体现。他们试图不断唱衰中国,正是将近代西方殖民“发家史”经验套置于当前中国发展趋势的思维。因而欲使西方相信中国强而不霸、有别于西方的主张是困难的,因为他们从未真正理解中国,从200多年前象征中西方大国相碰撞的马戛尔尼事件开始就是如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在应对世界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意味着对外传播能力的稳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能够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对构建新型的世界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当我们谈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的新时代的中国主张时,以及思考如何增强中国文化自信时,即是在探讨中国站在什么样的历史根基上去着眼现在、布局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客观的历史史实无法改变,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选择合适的视角去解读历史史实,是一个民族传承和延续文化血脉的体现。当前中国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可行性,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有责任采取一种沉着、自信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历经数千年沧桑变化的中华文明。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 区宗华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535.
- [2]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 掌故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90:715,650,691.
- [3] 张芝联,成崇德.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61,102,9-14,43,293-242,90,46-50,69,245-249,140,27-28.
- [4] 费正清,刘广京.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51.
- [5] 张之毅. 英国马嘎尔尼使华与乾隆对策新探. 外交学院学报,1988,1:43-49.
- [6] 朱庸. 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304-305.
- [7] 何伟亚.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邓常春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2;80;144.
- [8] 周锡瑞. 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 二十一世纪,1997,6:107-115.
- [9] 张隆溪. 什么是“怀柔远人”? 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 二十一世纪,1998,1:58.
- [10] 罗志田. 夷夏之辨与“怀柔远人”的字义. 二十一世纪,1998,5:144.
- [11] 罗志田.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 历史研究,1999,1:110.
- [12] 艾尔曼,胡志德. 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 二十一世纪,1997,6:118-121.

- [13] 葛剑雄. 就事论事与不就事论事——我看《怀柔远人》之争. 二十一世纪, 1998, 2: 105-113.
- [14] 杨念群. “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 读书, 1999, 2: 85.
- [15] 赵刚. 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 ——18世纪世界视野中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 视界, 2003, 9: 4-5.
- [16] 邹振环. 十八世纪中英两种世界观的对话与冲突: 儒家的“夷夏传统”与“礼仪之争”. 朱子学刊, 2003, 1: 344-347.
- [17] 但兴悟. 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 国际政治科学, 2006, 2: 5.
- [18] 李勇. 西方对马戛尔尼使华的历史阐释. 长春: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1.
- [19] 曹文娟、张振明. 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与中国法律的西传. 长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3, 6: 125-129.
- [20] 巫鸿. 马嘎尔尼使团与“中国废墟”的诞生. 紫禁城, 2013, 10: 148-155.
- [21] 万婧. 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面子协商——以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为例.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4: 128-132.
- [22] 黄一农. 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 近代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07, 3: 78: 1.
- [23] 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 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50: 268.
- [24] 姜飞.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91; 177; 14.
- [25] 王开玺. 清代的外交与外交礼仪之争.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7: 232.
- [26] 爱尼斯·安德逊. 英使访华录. 费振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92.
- [27] 斯当东.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叶笃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40; 37; 250; 325-326; 318; 225.
- [28] 朱杰勤译. 中外关系史译丛.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4: 197-198.
- [29] 礼记. 胡平生, 张萌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463; 7; 7.
- [30] 孙怡让. 周礼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348; 2946.
- [31] 萨莫瓦. 跨文化传播(第6版). 闵惠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18-119.
- [32] 乔治·H·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 赵月瑟译. 北京: 译文出版社, 1992: 115; 184.
- [33] 霍尔. 超越文化.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2.
- [34] 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王国卿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446; 448.
- [35] 王宏志. 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09, 63: 117-127; 117-127.
- [3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162, 282, 28.
- [37] 赵汀阳. 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41-44.
- [38] 白文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40.
- [39] 论语. 张燕婴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50.
- [40]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442-1444.
- [41] 尤淑君. 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393.
- [42] 何新华. 威仪天下——清代外交礼仪及其变革.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2, 2.
- [43] 钦定大清通礼(卷四十三).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5: 1-2.
- [44] 黄枝连. 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上卷): 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形态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96.
- [45]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张理京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 [46] 杨国斌. 当“公共领域”的使者求见“怀柔远人”的帝王. 开放时代, 1997, 5: 122.
- [47] 刘禾. 帝国的话语政治: 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杨立华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50.
- [48] 乔治·马嘎尔尼, 约翰·巴罗. 马嘎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何高济, 何毓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3-27; 7; 11; 220; 315-316; 479.
- [49] 张兵娟. 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18.
- [50] 刘禾.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2.
- [51] Carl Schmitt, *The Nomos of the Earth*, trans. by G. L. Ulmen, New York: Telos Press Publishing, 2006: 86.
- [52] 罗素. 中国问题. 秦悦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6: 38-39.
- [53] 英国博德利图书馆, MS Eng. Misc., f533, fol. 7//张芝联, 成崇德.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4.

- [54] 罗威廉. 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李仁渊,张远.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51-152.
- [55] 何伟亚.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刘天路,邓红风.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5.
- [56] 朱杰勤. 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562.

A Review of "the Rites Controversy"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Zhang Bingjuan, Li Yang (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led to the "dispute over ritual", whi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olli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t was also the "fuse" for China's modern history when the Opium War broke out more than 40 years later. For a long time,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of this event only criticized the isola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ignored the hidden intentions of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colonialism expansion. Criticism, this paper adopts post-colonial theory from th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to re-examine the spread of communicators motive, means, and because of the valu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deviation caused by factors such as cognitive impairment, made clear that the surface of the British mission is the spread of colonial hegemony tendency motivations behind trade demands, and presents the medium of choice implie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ttle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contrast of Chinese ritual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explanation of China's unique system of paying tribute by Binli and the mode of world communication order supported by it. It can be said that although the "colonial world model" shrouded in modern history has gone away, the colonial mentality imprinted on the mind has not dissipated. The re-examination of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will help us to keep a vigilant eye on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orrect the long-term aphasia of the loss of subjectivity in the "Chinese story", and rebuild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ispute over ritual between China and British;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 收稿日期:2020-05-27

■ 作者单位:张兵娟,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李 阳,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责任编辑:刘金波